

# 主持寻找中共一大上海会址的南通人

□ 姜松延

上海,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,也是共产党人的“初心之地”。从黄浦江畔石库门出发,我党已走过了百年历程,作为红色起点的“一大”上海会址,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梦想,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,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党员群众的朝圣之地。可你是否知道,七十年前奉命主持寻找“一大”上海会址的,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南通人。



## 1 受命寻找会址

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,因环境所限,只能处于秘密状态,没有公开进行活动。在大革命时期,党忙于国共合作、开展工农运动和支援北伐战争,没有条件对党的诞生进行纪念。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,又处于更加艰苦的农村战争环境或白色恐怖斗争,仍没有条件组织纪念。1938年5月,已落脚延安的毛泽东在《论持久战》一文中提出:“今年七月一日,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”。其实,曾参加“一大”会议的毛泽东、董必武回忆是七月份召开,但都已记不清确切的日期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因为缺乏档案资料,一时也无法查证,这就把7月1日确定为党的诞生纪念日。而将“七一”作为党的生日,最早见于中央文件,是在1941年6月的《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

纪念指示》中。尽管时间并不准确(后有学者考证了“一大”会议于7月23日开幕),但我党从此有了诞生纪念日。作为党史要素之一的建党时间已基本明确,可作为另一要素的会议具体地点仍未确定。新中国成立后,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非常重视对革命史迹的征集调查工作。上海是党的诞生地,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召开。核实、调查党的“一大”会址,恢复其原貌并修建成纪念馆,对广大党员、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教育意义极为重大。为此,1950年9月,时任上海军管会主任、上海市市长陈毅提议,并经上海市委讨论同意,决定寻找并修建党的“一大”会址纪念馆,以向即将到来的建党30周年献礼,会议同时决定,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具体负责此项工作。

姚溱,1921生于南通县金沙镇,当年刚满而立之年。别看年轻,但资历不浅:就读通中期间,已在报刊发表了不少文章;“一二·九”运动时,积极组织当地学生参加救亡运动;卢沟桥事变前夕,在通组织“友声社”并任社长,共同阅读、讨论进步书刊,宣传抗日;1937年年底,又与袁明、王晓曙一起编辑《救亡时报》,宣传抗日救国;1938年3月,与一批进步青年参加特务总队政宣队,并任民运科长。其父姚味香,系地方开明士绅,老国民党员,曾任县教育局局长、县政府第一科科长。为领导南通如海启等地抗日运动,中共江北特区委员会成立。因姚溱思想进步及其家庭背景,1938年8月,初建的江北特委就设在他家。11月,姚溱参加江北特委组建的金沙区抗日自卫队,任指导

员。1938年秋,江北特委发展第一批党员,尚未到龄的姚溱被破格吸收入党。1940年,姚溱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中文系。次年年底被调往淮南抗日根据地,协助筹建由新四军参与创办的江淮大学,之后即留下从事新闻工作。1942年,姚溱被牵入一起“左倾”冤案,经陈毅干预后才得以纠正。1946年年初,姚溱又被调回上海。根据上海地下党指示,成立“宣传委员会”并任书记。他以“秦上校”笔名在《时代日报》、“波光”笔名在《展望》周刊发表军事评论文章,揭穿国民党的军事谎言,并暗示战事之发展前景,令人拍案叫绝。上海解放后,姚溱任市新闻出版处处长,在夏衍领导下主管报刊、出版、广播等工作。1950年,姚溱升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。

## 3 建成红色地标

1951年7月1日,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《解放日报》出版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特刊,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刚刚找到的“一大”会址照片,标题是《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》。不久,上海市市长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毅、副市长兼市委第二书记潘汉年、市总工会主席兼市委第三书记刘长胜,一同参观了“一大”会址。此后,前去参观、瞻仰的人络绎不绝。董必武、李达也曾故地重访,现场确认了该会址。

1951年10月8日,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:“一大”会址、老渔阳里2号及博文女校三处为纪念馆,并成立以夏衍为首的管理委员会,负责设计并领导这三个纪念馆的工作。1952年9月,中共一大会址以“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第一馆”为名接待一些外宾和领导参观。1968年正式改名为“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”。自建成纪念馆并对公众开放后,参观人员一直络绎不绝,人们来这里了解历史,接受熏陶。如今,“一大”会址纪念馆已经成为上海最重要的红色地标之一,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教育之地。

1954年,姚溱奉调中宣部,先后任国际宣传处副处长、处长,1959年,升任中宣部副部长,后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。但在“文革”开始后不久,1966年7月23日,这位来自江海大地、才气横溢的姚溱,在重重政治诬陷和迫害下含冤自尽,时年45岁。

## 2 如期完成重任

此时,离中共一大召开已经过去了近30年。其间,屡经战乱,当年的建筑是否安然无恙,实在是一个未知数。为了完成上海市委交办的这一特殊任务,姚溱在会后即组织人员,成立了一个以姚溱、沈之瑜、杨重光为主要成员的寻访小组,着手对中共“一大”会址的调查勘实工作。1950年9月,福州路上海市委大楼内,姚溱召集沈之瑜和杨重光于宣传部办公室开会,具体研究寻访“一大”会址的方案和步骤。

沈之瑜,原名茹志成,著名作家茹志鹃胞兄,时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干部,1958年起任上海博物馆馆长。杨重光,于1946年任职《联合日报》期间入党,俄、英、法会话、写作水平高。1949年8月,奉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,除日常工作外,负责接待在上海过境的苏联外宾。出版有《苏联的出版》《苏联地理》等译著。

寻访小组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找到了仍留在上海的“一大”会议出席者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,同时又从其子周之友处获悉,周佛海曾有一本名为《往矣集》的回忆录,书中记载有中共“一大”召开的有关情况。根据姚溱的安排及

其提供的有关线索,沈之瑜、杨重光分工合作,展开寻访。1921年的杨淑慧,为时任上海市总商会主任秘书杨卓茂之女,经闺蜜王会悟(系“一大”代表李达之妻,曾负责“一大”会务工作)牵线,开始热恋的杨淑慧在当年盛夏曾随周佛海在陈独秀寓所、即《新青年》杂志编辑部居住过,也到李汉俊家里去过几次。周之友,原名周幼海,周佛海、杨淑慧之子,于1946年杀出旧营垒,投奔共产党,时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二室副科长。根据周之友提供的线索,沈之瑜在图书馆查阅了早已被封存的《往矣集》一书,在该书的“扶桑笠影溯当年”章节,周佛海在回忆当年参加中共“一大”会议的内容里,所提及的两个地点很有价值:“一大”代表的住宿地是“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”;开会地点在“贝勒路李汉俊家”。与沈之瑜同行的杨淑慧,很快就找到了她最熟悉的、时处南昌路的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旧址。在宣传部干部沈子丞调阅了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中小学注册簿后,杨重光又在太仓路老居民帮助下,找到了一幢镶嵌着红砖的青

砖二层楼房——博文女校,即当年的中共“一大”代表住宿地。值得一提的是,博文女校由湖北蕲春人黄绍兰创办并主持,1920年,该校因经费问题停办后,黄绍兰到南通女师任国文教员。1921年春,黄绍兰多年的忘年交、张謇之兄张警重其文章志行,出资助黄回沪重开女校。就在中共“一大”开幕前四天的7月19日,博文女校名誉校长张警重与黄炎培等人联名,为该校招生及黄绍兰题字发布启事。因学校紧邻李汉俊家,又恰好刚放暑假,便由与黄熟识的王会悟出面,租了楼上3间房用于住宿,黄绍兰不假思索便答应了。最紧要也是最难找的是贝勒路李汉俊的家,但由于原先住宅变化较大,到了该地段后,杨淑慧一时也拿不准。在这一带来回走了许久,当看到一处写有“酱园”二字的房子时,她才神情一振,而紧邻酱园的就是一幢有着“恒昌福面坊”大字招牌的两层石库门。看了好一阵子后,杨淑慧有了一点把握,终于说:应该是这里了!——“一大”会址基本认定。姚溱等市委宣传部领导听了已经找到“一大”会址的汇报后,都非常高兴。中共上海市委对此

非常谨慎,并没有就此立即确定“一大”会址,而是进行了现场拍照。随后,杨重光奉命于1951年5月专程携照片赴京请示。据杨晚年回忆,他把照片交给了胡绳同志,经胡绳请毛泽东和董必武看过博文女校照片后,认为“这不是他们开会的地点,而是开会时住的地方”,同时告知:“会议是在(现任)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家里开的,他的弟弟李汉俊(早已牺牲)是党的一大代表”。杨重光旋即拜访了李书城,确认了“一大”会址在上海租界望志路,李虽不知道后来的路名和门牌号,但他回忆了那幢房子的大体位置。回沪后,杨重光立刻向姚溱汇报了情况。姚溱当即建议他联系杨淑慧,并将杨淑慧的电话号码给了杨重光,又经多次实地勘查,终于在当年6月确认了已地处兴业路的“一大”会址。在此过程中,姚溱一直关注着沈之瑜等人寻访情况,并在了解进展情况后及时给予指导。当“一大”等三处革命旧址被找到后,他又指示寻找一处最早的团中央活动机关,并提供了该处对外原是一所外国语学校的线索。在杨淑慧配合下,也很快就找到了该旧址。